

# 论洋务派兴建海军的目的和作用

王承仁 刘铁君

兴建海军和海防,是洋务派“自强”活动的重要内容。目前,学术界围绕洋务派兴办海军的目的和作用开展的争议,既是一个如何用正确的方法客观地反映这一历史事件的本质的问题,也是关系到对洋务运动的评价。我们拟就这个问题谈些粗浅看法,就教于学术界。

## 一

洋务派大力兴建海军开始于19世纪70年代。这时正是国际自由资本主义开始向帝国主义过渡,资本主义列强“开始了争夺殖民地的大高潮,分割世界领土的斗争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sup>①</sup>的时期。远东是当时的西方列强争夺的重要地区之一,中国及其近邻国家是他们争夺殖民地的重要对象。资本主义列强这时对中国侵略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企图从海上侵入中国腹地,逐步征服中国。当时形势向中国提出了兴建海军和海防以阻止侵略者野心实现的严重任务。正是在这样的时刻,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极力强调兴建海军和海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以国帑重金购置船舰。这种主张和行动,明显地反映了还没有完全形成半殖民地社会的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与外国侵略者之间还存在严重的矛盾,封建地主阶级还不甘心完全屈从于侵略者的客观实际的一面,是民族矛盾激化的产物。因此,兴建海军和海防,客观上符合民族利益,是必要和无可非议的。

但是,能否就此就认定洋务派是在爱国思想支配下兴建近代海军,并断定他们兴办海军的目的就是为了反侵略呢?历史事实说明不能这样简单地回答问题。这正如不能因为清政府中的顽固派在对外战争中主张抵抗,讲了一些要求抗敌的激昂之词,客观上符合民族要求,就肯定他们是爱国者一样。对此,我们还必须做具体的分析。列宁指出:“要辨明政党斗争的是非,就不相信言词,而要研究各政党的真实历史,主要不是政党所说的话,而是研究它的行动,研究它们是怎样解决各种政治问题的……”<sup>②</sup>。根据列宁这段话的精神,对洋务派兴建海军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就不能停留在对一般形势的分析和摘录他们的“闪光”语言上,而是要深入研究他们的言行,研究他们执行的对外政策和他们对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所抱的态度,才能作出符合实际的科学结论。

军队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对内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对外抵御外侮的职能。任何一支军队行使它的对外职能,都是与之相应的对外政策紧密联系,并为对外方针政策所制约和决定的。因此,洋务派兴办海军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必须要与他们执行的对外方针政策联系起来考察。那种把洋务派兴办海军的目的同他们执行的对外方针政策分割开来进行研究的方法,显然是不妥当的。

历史事实说明,整个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的首领们执行的对外方针政策,是接受中国

所处的半殖民地的社会地位，对外国的新侵略力主妥协退让。奕訢在北京条约签订后不久就提出，对侵略者要“待之优礼”，“以信义为重”<sup>③</sup>，要完全按照条约办事，做到“外教信睦，而隐示羁縻”<sup>④</sup>。曾国藩则认为“洋人之患，此天所为，实非一手一足所能补救”<sup>⑤</sup>，用“天命论”来说明中国半殖民地社会地位的不可改变性。为此，他主张对侵略者要信守“忠信笃敬”四字，要做到“无论彼之或顺或逆，我当常守此而勿失”<sup>⑥</sup>，并提出清政府以后的对外政策应是“守定和议，绝无改更，……今后仍当坚持一心，曲全邻好”<sup>⑦</sup>。李鸿章更是主张要维护已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说什么“各国条约已定，断难更改”<sup>⑧</sup>，强调“两国相交，全靠条约，条约如何可以改变”<sup>⑨</sup>，并把要求驱逐侵略势力的主张诬蔑为“虚妄之论”<sup>⑩</sup>。洋务派的这种方针政策，虽有要求维持中国的半殖民地现状，不使其深化和发展为殖民地的愿望。但是，以妥协退让求苟安，却正好适应了资本主义列强的需要，而造成把中国引向更痛苦的深渊的恶果。王韬当时就曾指出这种政策的误国情况。他说：“泰西大小诸邦，叩关互市，辄以兵力佐其商力，所至各埠设官置戍，饘饉相望，每挟其所长，从而凌侮我，来必应，请必遂，一旦齟齬，而伺我者数十国，腹心肘腋间，遍布森列，几乎国不可为国矣。嗟乎！此盖误于羁縻之说，而驾驭未得其宜也”<sup>⑪</sup>。洋务派在侵略者面前这样卑躬曲节，与爱国主义是水火不相容的。

正是在上述外交方针政策的思想规定下，洋务派首领们一再表示他们办海军的目的，绝不是为了驱逐外国侵略势力，争取民族独立。曾国藩说，中国设厂造船，是“为本省捕盗护运之用，初无耀兵瀛海之意”<sup>⑫</sup>，“上海机器局及福建船政局，开办已阅数年，所购皆系洋器，所用多西人，彼中习见所闻，知我本无意开衅”<sup>⑬</sup>。奕訢则进一步表示：“就使海防一律办齐，……仍当遇事筹帷，慎于操纵”<sup>⑭</sup>。李鸿章则将造船购舰的目的归纳为“守疆土，保和局”六个字，并说：“海外之险，有兵船巡防，而我与彼可共分之；长江及各海口之利，有轮船转运，而我与彼亦共分之，或不让洋人独擅其利与险，而浸至反客为主”<sup>⑮</sup>。这就是说，他们所努力维持的，是在中国的领海、港口及内河与外国侵略者保持平分秋色的局面。他在后来的一个奏折中，进一步说明这种方针决不是目前的权宜之计。他说：“目前固须力保和局，即将来器精防固，亦不宜自我开衅。彼族或以万分无礼相加，不得已而应之耳”<sup>⑯</sup>。由此可见，他们办海军海防，只不过是列强进一步侵略时，经过再三退让仍不能求得和局时消极地招架一下而已。洋务派首领们异口同声的言词，把他们“自强”、“御侮”的真谛道得再也明白不过了，但有的同志却硬要说他们办海军的目的是为了“反侵略”，这实在是人为地拔高。我们认为这不如把洋务派办海军的目的看成是要维护当时已经形成的半殖民状况使其不再发展，更符合他们的思想实际。

应当指出，“守疆土，保和局”两方面，在李鸿章等洋务派首领们的心目中并不是并重的，在他们认为二者不可得兼时，就宁可舍弃国家的领土主权。李鸿章就认为玉门关外是“千里之旷地”，即便为英、俄侵占，也是“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并断言，“即勉强恢复，将来断不能久守”<sup>⑰</sup>，迟早还是人家的。因而主张停兵撤饷，把省下的钱加强他直接控制的北洋海军的建设。1879年崇厚与沙俄擅订《交收伊犁条约》，规定要偿付巨款和割让新疆大片领土给俄国，引起举国上下的不满和反对，李鸿章为了“保和局”，坚持要清政府批准并履约。从李鸿章等对整个国家的防务和民族利益所抱的这种态度，可以看出他们的所谓“守疆土”，实际上只是保住封建朝廷的安宁和供给他们享用的一隅之地。这与真正的爱国思想没有相同之处。

上述历史事实说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统治阶级，虽然与外国侵略者有一定的矛盾，但在侵略者的威胁和压力之下，为了他们狭隘的阶级、集团和个人的利益与安危，往往

要向外国侵略者妥协屈膝。这就决定了洋务派不可能真心实意地反侵略，不可能是在真正爱国思想支配下建立一支以反侵略为已任的海军。

## 二

任何军队的本质都是由它所属的国家、集团的阶级本质所决定的。洋务派兴建的海军，从它呱呱坠地的时候起，就深深地打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腐朽统治阶级的烙印，不能成为真正抗敌御侮的有效工具。主要表现在：

第一，这支海军是依赖西方列强建立起来的。19世纪70和80年代，中国社会经济和军事技术都很落后，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兴建近代海军，购买外国一些优良船舰，聘请一些外国的军事人员和技术人员来训练部队，是完全必要和不可避免的。问题的关键不在这些，而在于李鸿章等只强调买，不强调造，并且要已有一定制造船舰能力的中国船厂也不要制造，专搞修理。他在一个奏折中说，福建船政局等所造轮船，“皆仅与外国小兵船根拔相等，然已费银数百万有奇，……中国造船之银，倍于外洋购船之价。今急欲成军，须在外国定造为便。……而中国船厂仍量加开拓，以备修船地步”<sup>⑮</sup>。在他的影响下，“各省需用轮船，多向外洋订购，中国船政局每欲承揽一、二只而不可得”<sup>⑯</sup>。这种依赖外国而不思自力更生的方针政策，显然是不足取的。

西方列强对洋务派购买船舰是极力支持的。他们宣称，只要“中国有一天的钱，就可以买一天海陆军所需要的任何东西。整个文明世界都切愿把武器供给他”<sup>⑰</sup>。西方列强积极卖船舰给洋务派，并不是要帮助中国建立一支足以抵御外侮的海军力量，而是既要推销过剩的军用品以获巨利，又要加以限制，使其只能对内镇压不能对外御敌的队伍，并以此作为在清政府中扩展支配力量的手段。为此，列强之间展开了向中国推销舰炮和控制中国海军的激烈争夺。问题的严重性不在于侵略者抱有不可告人的目的，而在于李鸿章等对侵略者的本质毫无认识，只在口头上讲了一些防范之词，实际上是完全依赖。

洋务派购买船舰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即19世纪80年代以前和以后。80年代前，清政府所购船舰几乎全部来自英国，所依赖的人是赫德，“一切由总税司担承”。赫德其人“是阴鸷而专制，怙势而自尊，虽食厚禄，受高职，其意仍内西方而外中国”<sup>⑱</sup>，是英国在华利益的代理人。从70年代末开始，德国逐渐成为李鸿章购买船舰的另一大卖主，并有取代英国之势。在购买德国船舰时，李鸿章所依赖的是德国驻华公使巴兰德、德国海军部、外交大臣毕士马克和大军火商克虏伯等人。在李鸿章眼里，这些人都是“认真襄理，况瘁不辞，询属畛域无分，效忠出力者”<sup>⑲</sup>。在这些外国代理人的操纵下，李鸿章从1875—1887年，先后向英、德购买了船舰16艘，鱼雷艇6艘，并于1888年建成北洋舰队。

清政府近代海军兴建的过程，就是资本主义列强争夺对它的控制权的过程。7、80年代之交，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向英国外交部说：清政府进行“军事改革，只能交由一个外国来担任”，“如果这个外国不是我们，那我们的利益就要受到极大的损害”<sup>⑳</sup>，表示不许他人染指的意向。中法战争后，赫德给英国外交部的一份电报中，更是反映了争夺的激烈情况。电报指出“法国人、德国人和美国人现在都想谋取（中国海军）领导。但我仍将中国海军保持在英国人手中。海军衙门成立是一进步，中国极需琅威理来。煊赫的前程已经展开，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务遣其来华”<sup>㉑</sup>。美国人何天爵记述当时的争夺情况是：“当李鸿章总督建议任用外国人担任某一显要或有权势的地位时，在北京有外交代表的欧洲政府都愿意为自己国人争取

这个位置，因此，竞争、倾轧、阴谋、密计全都发生了，有时动用尊严的外交文牒”<sup>②</sup>。争夺的结果，北洋舰队所用的多是英、德两国人员。这些被聘用的外国人，往往以主宰者自居，“他们认为他们有权来决定谁可以向他们发布命令，并且认为他们在接到这样发布的命令时，有权利决定是否要服从”<sup>③</sup>。

由于中国海军开始兴建就卷进了资本主义列强争夺的漩涡，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其控制和操纵，因而使得中国用高昂代价所购的船舰，并不是李鸿章所说的是什么“海口战守利器”<sup>④</sup>，“各国罕见之新式”<sup>⑤</sup>，而是有严重毛病的次等货或劣等货。如70年代购买的英国炮船，英国海军部自己都不敢相信它们能经得起长途跋涉，驶抵中国<sup>⑥</sup>。它们的船身“均系钢片镶做”，仅行使一年，船身便被“海水浸渍”，轮机锅炉也需“重加修整”，后来更是“岁需两修”<sup>⑦</sup>。这些船的自卫能力很低，一中炮弹，立即沉没<sup>⑧</sup>。1880—1885年在德国订购的“定远”、“镇远”、“济远”三大舰，也不是什么上等利器，而是偷工减料或过时之器。“定远”原定1882年7月完工，但“该厂商缘料件被驳，重加修换”<sup>⑨</sup>，以致延至第二年完工。“镇远”则是工料不及“定远”，而当时价值计增10万<sup>⑩</sup>。“致远”的致命弱点是如遇炮击穹甲虽无伤，而全船可沉，“掩口炮台，炮子能入而不能出，伤人必多”；“船底太轻，较他船为易覆”<sup>⑪</sup>。1887年在英国所购的“靖远”、“致远”两巡洋舰，连英国人琅威理也不得不承认是尚须“改装和更加进益之处甚多”<sup>⑫</sup>的次品。

资本主义列强不仅不向中国提供优良的船舰，还以种种借口阻挠和破坏中国所购船舰投入反侵略的战斗。“台湾之役，沈葆楨曾订购（铁甲船）一只，外国据万国公法阻之云：‘中国与日本有隙，他国不得助军火’”<sup>⑬</sup>，撕毁订购合同。中俄关系吃紧时，英国又以同样理由“不能再践前言”，废除了原允卖给中国的两艘铁甲舰之约<sup>⑭</sup>。中法战争期间，“德国守局外公法，不准我（订购的）铁舰来华”<sup>⑮</sup>，严重地削弱了我海军的抗法力量。

对于洋务派仰赖列强和列强借机操纵和破坏给中国海军蒙上的阴影，当时就有人指出：“今国家讲求武备，凡所有船械不自行制造，皆仰给于人，若一旦失和，各国谨守公法，不肯出售，悔之何及”<sup>⑯</sup>。有的则说：“夫船炮购自外洋，无论上等者不可得，即果得上等之器，而购其器或须募其人。又器精者价倍昂，频频以重金溢外洋，中国愈形虚耗，已大不可；况一旦失好，则彼守局外之例，我即有坐困之忧，其计之左莫甚于此”<sup>⑰</sup>。就连奕劻也不得不承认：“仅藉洋人充船主、大副等紧要司事，终是授人以柄，不得谓之中国海军”<sup>⑱</sup>。但洋务派的买办性决定了他们不能改变自己的错误方针。

第二，洋务派兴办和掌握的海军还具有浓厚的封建集团性和腐朽性。

李鸿章等办海军一开始就具有借“御侮”之名，而行扩张本集团势力之实。这不仅表现在他们在经办自己的海军和海防时很少顾及其它海军和海防建设上，更表现在对外战争中，他们各自拥兵自重，互不相救。中法战争时，北洋、南洋、福建三支水师各据一方，清政府调其它两处船舰增援福建，李鸿章、曾国荃先是找借口拒不发兵，既出又徘徊不前。由于“援闽之师久而不出，出则迟回观望，畏葸不前，使法人得窥其微，截商阻漕”<sup>⑲</sup>。1885年，清政府为了统一海军领导成立海军衙门，但“畛域攸分”的状况仍不能改变。甲午战争时，李鸿章调南洋水师助战，遭到刘坤一、张之洞的拒绝，致“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sup>⑳</sup>。

海军衙门的设立不能改变疆臣拥兵自重的局面，但却成了李鸿章名正言顺地掌握海军大权，扩张淮系实力的时机，使淮系成为清政府各集团中占压倒优势的集团。对于这种情况，海军衙门成立时就有人指出，李鸿章“今既奉命会办，设遇海氛，仍踵故智，拥兵自卫，不权缓急，专以保护畿辅为名，虑朝廷亦无以夺之，则是水师者非中国沿海之水师，乃直隶天津

之水师，非海军事务衙门之水师，乃李鸿章之水师也。……再阅数年，兵权益盛，恐用以御敌则不足，挟以自重则有余”<sup>④</sup>，这确是切中了要害。

北洋海军一开始就充斥着封建腐败气息。这支海军的编制、营规都按照清朝陆军的旧套，不能适应近代战争的需要。海防要塞和海岸守卫部队与海军互不统辖，各自为政，战时不能互相配合。更有甚者，是李鸿章在这支军队中植党营私，亲友故旧遍布要津。其中如担负供应海军军火的天津军械总局总办张士珩，总办兵洋船坞工程兼办水陆各营务处的龚照屿，都是臭名昭著的贪鄙腐化之徒。北洋舰队内部也是派系森严，纪律松弛。“提督丁汝昌本陆将，且淮人。孤寄群闽人之上，遂闽党所制，威令不行，……操练尽弛。自左右翼总兵以下，争攀眷陆局，军士去船以嬉。每北洋封冰，海军岁例巡南洋，率淫赌于香港、上海，识者早忧之”<sup>⑤</sup>。这些腐败现象，都是与没落时期的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性分不开的。

第三，洋务派控制的海军，受李鸿章对外妥协和的方针政策的制约和把军队看成私产的利己性的影响，始终执行的是消极防御、退让避战的战略方针。

1876年，清政府计议购造船舰时，李鸿章就提出，外国军舰难以深入水浅的中国海口，因而只需“制造中等根拔船（炮艇）分驻内洋港口”<sup>⑥</sup>就可以了。1885年，李鸿章又重申遇到战争时将海军“收进海口，以守为战”<sup>⑦</sup>的指导思想。甲午战起，在日军咄咄逼人的侵略锋芒面前，他又给北洋舰队明确规定了“保船制敌为要”的“避战保船”原则。这种战略思想，决定了海务派的海军不可能积极认真的抵御外侮，充其量只是统治集团求得对外妥协以自保的工具。

有同志认为，洋务派办海军的失败，是因为他们的目的与实践手段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即目的是好的，手段不对。且不论这种提法在理论上能否成立，就以事实而论，上述建海军时依赖外国，视海军为私产，消极避战的战略方针，等等，难道不是他们主要是为了阶级、集团的私利的目的决定的吗？！怎么能说目的是好的，只是手段不对！正是他们主要不是从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才使这支海军发展艰缓，屡屡被动挨打，终至最后覆灭。洋务派办海军的目的、手段和所走的道路基本上是统一的，这是被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和洋务派官僚集团的腐朽性和买办性所决定的。

### 三

洋务派从草创建立近代海军至北洋舰队覆灭，经历了20多年。与此相伴随的，是清政府在侵略者面前步步退让妥协，使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日益加深。考察这两个大致同步的过程及其内在联系，可以清楚地看出洋务派所兴办的海军到底起了什么作用。

清政府的海军是在外国侵略的刺激下，感到不“自强”就不能自保才开始创立的。到70年代中期，已拥有20余只小型兵船。当时，正值列强环伺，蚕食中国边疆。1874年，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日本出兵侵略台湾。李鸿章明知“日船非中国新船之敌”，“中国兵将之众断不畏彼三四千人”<sup>⑧</sup>。但他害怕战争，一味依靠美国“调停”，并致函总理衙门，“乞恩稿赏犒牵若干。不拘多寡，不作兵费，俾得踊跃回国”，并说这是为了“内不失圣朝包荒之度，外以示羁縻勿绝之心”<sup>⑨</sup>。清政府终按李鸿章的办法与日本订台事专约三条，赔赏日本白银50万两了结。1879年日本见清政府软弱可欺，正式吞并琉球，李鸿章又以“琉球地处偏隅，尚属可有可无”<sup>⑩</sup>，不作认真过问。这种政策确如侵略者所说：“这种和解的确注定了中国的命运，它向全世界宣告着，这是一个富有的帝国，它准备给钱但是却不准备打”<sup>⑪</sup>。李鸿章之流的卖国行径极大

地刺激了日本及欧美列强的侵略胃口。

台湾事件在清政府背上抽了一鞭子,促使它加快了建设海军的步伐。80年代中期,北洋、南洋、福建三支水师已初具规模,如果认真备战,协同战守,对外来侵略是可以发挥很大的御敌作用的。但在中法战争期间,李鸿章却不是认真备战,而是散布“各省海防,兵单饷匱,水师又未练成,未可与欧洲列强轻言战争”<sup>⑤</sup>,法国“船械之精,操演之熟,海上实未可与争锋”<sup>⑥</sup>等论调。这就严重地影响了战局,使中国水陆各军处于被动地位,法国舰队则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开进了中国军港,与中国舰队同泊马江并加以封锁。就在福建水师大祸即将临头之际,李鸿章还多次电告张佩纶,要他“切勿孟浪”<sup>⑦</sup>;直到法舰进攻的前一天,他还打电报给何如璋,“尚言和议大有进步”,致有人向何报告“当时必有战事”时,何如璋还认为“必系谣传”<sup>⑧</sup>,不作应战准备,导致福建水师仓促应战,迅即全军覆没,马尾船厂被毁。最后,李鸿章竟以中国在军事上的胜利作投降的资本,认为“谅山已复,此时平心与和,和款可无大损,否则兵又连矣”<sup>⑨</sup>,与法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法新约》。难怪战后不久就有人抨击他是:“议和则李鸿章先占人先,议战则李鸿章必落人后”,质问他“今此之海军为战地乎?为和地乎”<sup>⑩</sup>?

中日甲午战争对洋务派所办海军进行了一次全面而严峻的检验。建成不久的北洋舰队在当时的亚洲可算是比较强大的。1891年,李鸿章就夸耀说:“海军战备,尚能日新月异……但就渤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sup>⑪</sup>。1894年战争爆发前夕,他更得意地说:“此后京师东面临海,北至辽沈,二千余里间,一气联络,形势完固,已无可蹈之隙”<sup>⑫</sup>。一俟战祸临头,他就象泄了气的皮球,腔调变了,说什么中国舰船行驶速度不及日船,“海上交锋,恐非胜算”,“倭与(日舰)驱逐大洋,胜负实未可知,万一挫失,即赶紧设法添购亦不济急,惟不必定与拼击,但令游弋渤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势”,要求清廷按他的“以保船制敌为要,不敢轻于一掷”<sup>⑬</sup>的消极避战的方针行事,这就决定了在这场战争中北洋舰队不能制人而只能受制于人的命运。据当时“定远”舰总管轮陈兆锵回忆,丰岛之战前两天,“丁提督(汝昌)与各舰管带共筹决策,金以先发制人为上,遂即传令各舰备便待发,电李傅相,请旨开驶,若遇日舰,即行攻击”。清政府和李鸿章不同意主动出击,“以致此计不成,失去莫大机会。设使当时准即开驶,计其行程与时间,正遇着‘济远’与‘吉野’作战之时,‘吉野’速率虽快,其奈牙山口外不广,无以展其能。且我众彼寡,必操胜算。倘‘吉野’一去,其余不足虑,则中日战役为所影响者必甚”<sup>⑭</sup>。黄海战役中北洋舰队虽然损失较重,但主力“镇”、“定”二舰尚称完好,而日本舰队的几艘受重伤的战舰需一月致数月才能修复,暂时不敢与中国海军正面交锋。但李鸿章畏敌更甚,命北洋舰队困守威海“着保卫舰队,勿庸应战”<sup>⑮</sup>,把制海权拱手让给日本,使他们得以从容地以偷袭手段击破北洋舰队,最后把剩余舰艇拱手献给敌人。

从上述历史过程可以看出,洋务派建立的海军,不仅如时人形象地描绘的那样:“李鸿章酷喜西法,如富贾巨商玩器盈于前而无济于事”<sup>⑯</sup>,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并且,他们愈是有了较多较强的海军力量,就愈崇拜武器,笃信武器的优劣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在貌似强大的侵略者面前愈加软弱畏葸,招致愈来愈惨的失败,终于完全匍伏在手执战争利器的帝国主义脚下。

有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北洋舰队的建成,“对外国,特别是对日本起着一些威慑的作用”,“已起到了推迟日本进攻中国的作用”。这些观点是经不起历史事实检验的。

半殖民地的中国建立了一支较强的近代海军,引起列强的注视是必然的。但从它建成的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看,外国对中国的侵略有增无减,清政府对侵略者的态度也未因为有了

较强的海军而强硬起来，而是更为惧怕和软弱，对侵略者一让再让，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对侵略者哪有什么“威慑作用”？！至于日本未在1894年前发动侵华战争，也并非是中国有了铁甲舰，而是当时国际和日本国内条件不允许。早在明治初年，日本军阀中就有人提出要尽快地进攻中国，无奈力不从心。中法战争一结束，日本统治集团中有人主张不给中国以喘息时间，立即发动侵华战争。这时，“定远”、“镇远”两主力舰还未来中国，“经远”、“来远”、“靖远”、“致远”四大巡洋舰还未订购，尚无北洋舰队。但伊藤博文为首的一派却认为，如果立即发动战争，由于力量不足，不仅仅不能达到侵略中朝的目的，反而会造成有利于沙俄侵略朝鲜的形势，主张积极准备，待机发动。为此，日本政府从1885年起实行10年扩军计划。这就说明，日本当时没有发动战争，与北洋舰队毫无关系。从日本这时开始的10年扩军计划看，他也是要在完成或提前完成这个计划后才对中国发动大规模战争。1888年北洋舰队建成，日本根据中国海军的情况对扩军计划作了些调整，但他的扩军计划还是提前两年完成，紧接着就是积极寻找和制造战争借口，这哪里起了什么使日本推迟发动侵略战争的作用呢？！

还有同志认为，没有北洋舰队的建立就没有部分爱国官兵的英勇抗敌，从而把爱国官兵的功劳记到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办洋务的身上。这种推论既经不起推敲，更不能反映事物的本质。众所周知，在中国近代的历次反侵略战争中，都有一部分清朝的爱国官兵挺身英勇抗敌，给侵略者以不同程度的打击。这是由于他们受到人民群众反侵略要求和行动的影响，他们的爱国行为是时代潮流推动的结果，激于爱国义愤的产物。如果因为他们是清军的成员而把这些归功于清政府，实在是说不过去，如果把北洋舰队的将士的英勇抗敌归功于李鸿章，那么，慈禧太后不是也该记大功吗？因为如果没有慈禧太后的同意和委派李鸿章等筹建，没有清政府的拨款，北洋舰队是建立不起来的。显然不会有人同意这种意见。事实是那拉氏和李鸿章等人的对外妥协退让，压抑了爱国官兵的反侵略积极性和主动性，并断送了北洋舰队，也断送了国家的前途。甲午战后就有人指出：“清师之败，李鸿章有三误：一误于望和，二误于待和，三误于求和”<sup>④</sup>，这个结论是符合历史事实的。爱国官兵的英勇抵抗与李鸿章的先是误国后是卖国的政策有着本质的差别，是根本对立的。如果说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那就是爱国官兵的牺牲、北洋海军的覆没与李鸿章执行的误国政策有直接间接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这种政策的牺牲品。

#### 注释：

- ① 《列宁全集》第22卷，第248页。
- ② 《列宁全集》第18卷，第30页。
- ③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69，第2页。
- ④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1，第18页。
- ⑤ 《曾文正公全集》批牍，卷3。
- ⑥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18。
- ⑦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35。
- ⑧⑩⑪⑫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
- ⑨ 《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3。
- ⑩⑪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19。
- ⑪⑫⑬⑭⑮ 《洋务运动》（八），第8—9、471、472、486页。
- ⑫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32。
- ⑬ 《曾国藩未刊信稿》，第85页。
- ⑭⑮⑯⑰⑱⑲⑳ 《洋务运动》（二），第338、335、345、423、490—491、454、566页。
- ⑲⑳㉑㉒㉓㉔ 《清末海军史料》（上），第127、113、1、68、350、351、69页。
- ㉕㉖㉗㉘㉙㉚ 《洋务运动》（三），第359、68、399、14、125、17、194页。
- ㉛ 季南：《一八八〇—一八八五年，英国在华

的外交》，第215页。

- ㉜㉝ 魏尔特：《赫德与中国海关》，第480、473页。
- ㉞ 《李文忠公全集》海军函稿，卷1。
- ㉟ 《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10。
- ㊱ 《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15。
- ㊲㊳ 转引自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第102、103页。
- ㊴ 《洋务运动》（一），第566页。
- ㊵ 《中日战争》（三），第112页。
- ㊶ 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
- ㊷ 《李鸿章全集》奏稿，卷19。
- ㊸㊹ 《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卷2。
- ㊺ 《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卷8。
- ㊻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第301页。
- ㊼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14。
- ㊽ 《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4，第23页。
- ㊾ 《中法战争》（四），第186页。
- ㊿ 《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5。
- ①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72。
- ② 《清末海军史料》（下），第578—579页。
- ③ 《中东战纪》，第1页。